

代际更迭视角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周方冶

摘要：中泰建交 50 年来，双边关系已稳步形成了安全互助、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态势，并确立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目标。不过，泰国当前正处于代际更迭的重要过渡期，并在国内现代化道路“再选择”、全球经济衰退、中美战略博弈等内外因素影响下，面临新旧世代的严重代际分化，从而对中泰关系的“稳定性”与“确定性”都产生了不确定性冲击。为了在新时期“化危为机”，进一步推动中泰战略合作走深走实，有必要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示范作用，立足国际 / 地区多边合作尤其“全球南方”合作以化解美西方对泰“选边站”施压，推动中泰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以增强泰国新世代的“获得感”，拓展两国新生代人文交流以延续“中泰一家亲”传统友谊，从而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更宽广的前进道路。

关键词：中泰关系；代际更迭；中国式现代化；中泰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5）04—0001—13

1975 年中泰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以冷战中后期破冰建交为起点，相继经历了建交初期以共同应对地区安全议题为重点的回暖阶段、冷战后初期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升温阶段以及 21 世纪以来的全面深化阶段。从 2001 年两国就推进中泰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到 2012 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 2022 年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边关系已稳步形成了安全互助、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态势，并确立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目标。时值中泰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于 2025 年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时强调指出，要“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①，从而为新时期中泰战略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不过，泰国当前正处于代际更迭的重要过渡期，其内政外交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很可能影响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于是，研判泰国代际更迭对中泰关系的影响路径与范围，并加以妥善应对，也就成为进一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的澜湄合作‘非对称风险’问题研究”（项目号：24BGJ067）、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号：DF2023YS48）、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展国家道路选择的引领作用研究”（项目号：ZKJC2423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方冶，男，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2/t20250206_11550000.shtml，2025 年 2 月 6 日。

步深化中泰战略合作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代际更迭的视角出发,探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可供选择的应对举措。

一、中泰关系研究的代际更迭视角:范式与路径

国内外学界对中泰关系的既有研究,通常着眼于四方面的关键变量:其一是大国博弈,即以泰国传统的“风中竹”外交理念为切入口,探讨泰方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对冲”策略与“选边站”可能性^①;其二是合作红利,即以中泰互利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红利为切入口,探讨泰方在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背景下的中泰关系^②;其三是政治局势,即以泰国政局为切入口,探讨泰国内政对中泰关系的影响^③;其四是社会文化,即以传统文化纽带与华人移民为切入口,探讨民心相通对中泰关系的影响^④。

尽管既有研究已基本涵盖了地缘、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元变量,并对中泰建交 50 年来的双边关系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力,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泰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面临的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却难以在既有的多元因素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因此,为更好地推动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就有必要在原有分析框架基础上,关注新变量以提升对新形势的解释力与预判性。

目前来看,泰国代际更迭正成为影响中泰关系的新关键变量。所谓“代际更迭”,是指新世代群体逐步取代旧世代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对象国内政外交的演化过程。其影响深度与广度与代际分歧烈度呈正相关,甚至有可能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引起对象国现代化道路的结构性调整(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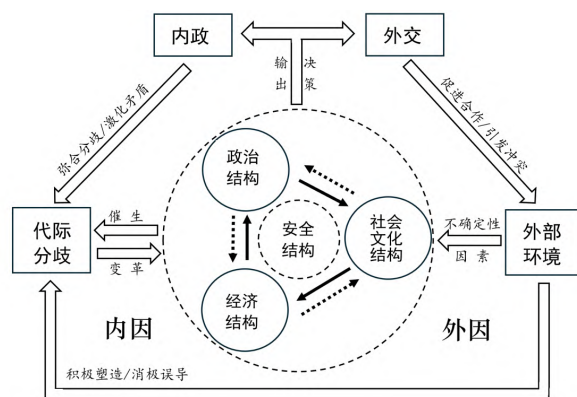


图 1 代际更迭的作用机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代际更迭的作用机理来看,有以下方面值得留意:

(一) 代际分歧是引发对象国现代化道路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动因

尽管从表象来看,新旧世代之间的代际分歧源自成长时期不同导致的年龄/认知差异,但就本质而言,却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瓶颈。事实是,如果对象国在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上行稳致远,那么其国内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将有序运作,并为良好的“安全结构”提供有力支撑,而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更替,也将更多地体现为代际传承与延续,而不是横亘在新旧世代之间的裂痕与矛盾。

反之,如果对象国原有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并不符合本国国情或不再符合本国国情,那么其国内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运作就可能失衡,并在未能妥善应对情况下从单一结构失衡扩散到多重结构失衡,引发安全结构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催生超越行业、地域、族群、宗教、阶层、性别等

① Busbarat, P.(2024). “Bamboo Stuck in the Chinese Wind”: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 Factor in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6 (1) , 125–146; Swaspitchayaskun, J. & Surakitbovorn, S.(2023). Thailand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der USA-China Power Rivalry: The Difficulty of Balancing Influence and Hedging, *The Chinese Economy*, 56(4), 330-338.

② Zha, W. (2015). Personaliz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a Polici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7(2), 242–268; 宋清润、田霖:《利益、认知的耦合与泰国长期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周方治:《泰国政治分歧及对中泰关系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④ Tungkeunkunt,K. & Phuphakdi, K.(2018).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tic Discourse “China and Thailand Are Brothers”, *Asian Perspective*, 42(4), 597–621; 庄国土:《文化相似性和中泰关系:历史的视角》,《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常规分歧的代际分歧，并由此反馈形成对现代化道路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变革诉求（见图1）。21世纪以来，泰国在其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始终未能有效化解“未富先老”的经济困境、“保革冲突”的政治危机以及“泰式民主空心化”的社会文化困境等结构性难题，从而引发持续性的国内动荡，并导致了近年来的极左翼新生代变革运动，要求对现代化道路进行“再选择”。

（二）代际分歧受外部环境影响程度与对象国开放水平呈正相关

虽然代际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内因，即对象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错位引发的结构性失衡，但其造成的对立冲突烈度，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受外因即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对象国开放水平越高，国际化程度越深，其代际分歧受外部环境影响也就越显著。

一方面，外部环境将通过影响对象国“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有序运作，甚至引发“安全结构”不确定性风险的方式，从而对代际分歧产生间接影响。虽然代际分歧存在强烈的变革诉求，但并不必然导致激进运动甚至暴力冲突，而是始终有可能以更缓和的改良方式达成。不过，由于对象国已错失现代化道路选择良机，因此内生性回旋空间有限，需要依托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其提供更宽松的外源性回旋空间。如果外部环境恶化，那么不仅无法提供对象国所需外源性回旋空间，还会进一步压缩对象国原本有限的内生性回旋空间，进而激化代际分歧的对立冲突。例如，2020年至2021年的泰国新生代大规模“反政府”街头运动与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就与新冠肺炎引发的社会经济困顿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将通过信息传播方式，引导和塑造对象国新世代对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理解与认知，从而对代际分歧产生直接影响。虽然通过日常感知，对象国新世代能自发地形成变革诉求，但对缺乏长期实践的新世代而言，如何将变革诉求有效地转化为体制机制的改革路径或重构方案，却存在经验性难题。于是，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成功经验，也就成为新世代的必然选择。随着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蓬勃扩张，作为“虚拟空间原住民”的泰国新生代在对外交流与信息获取上，相较于旧世代拥有显著优势。这一方面为泰国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积极动力，有助于其在代际分歧压力下积极主动地借鉴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成功经验；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明显隐患，使得美西方宣扬的“现代化=西方化”话术更容易传播，并对新世代产生误导，促使后者在变革诉求与不满情绪影响下，质疑甚至否定旧世代在本土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与成就，进而激化代际分歧的对立冲突。

（三）代际分歧与对象国内政外交会形成螺旋式的持续交互反馈

代际更迭是持续演进的发展过程，通常不会在短期内就实质性改变既有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运作体系，但在演进过程中，新世代的变革诉求将会通过常规或非正规方式持续施压，迫使国家运作体系对其输入信息做出相应反馈，并在内政外交决策的输出过程中予以体现（见图1）。

不过，代际分歧不同于常规性的行业、地域、族群、宗教、阶层、性别等利益群体差异，其变革诉求更具有宏观性，从而使得新世代作为政治主体，其凝聚力更多是基于不满情绪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基于群体利益共识。这就意味着，如果旧世代在代际更迭过程中主动调适国家运作体系，使其契合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正确方向，并通过内政外交为新世代提供正反馈，以化解其不满情绪，将有助于弥合分歧，进而促使新世代“去政治化”；反之，如果旧世代无视新世代变革诉求，未能通过内政外交提供正反馈甚至产生负反馈，那就很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并使得新世代在更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下“政治激进化”，甚至陷入螺旋式的下行通道，造成对象国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危机。

二、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崛起冲击中泰关系“稳定性”

冷战前期，由于受美国“反共反华”的负面影响，中泰关系曾一度处于历史冰点，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以及美军撤出东南亚，中泰关系开始稳步回暖，并保持高度“稳定性”。对此，习近平主席评价指出，“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信、守望相助，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泰国总理佩通坦则赞誉，“50年来，泰中关系经历

风雨，始终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始终相互信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①

从图 1 所示的泰国内政外交影响因素来看，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共识，“两国高层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强劲推动”的政治互信，以及“‘中泰一家亲’的坚实民意基础”，从而使“中泰关系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堪称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典范”^②。不过，随着冷战后成长起来的泰国新世代，尤其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生的新生代相继拥有投票权，并渐次步入政坛，曾为中泰关系“稳定性”提供坚实根基的“安全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开始面临变革性冲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时，相较于经历过冷战苦难的旧世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年代并享受“全球化”红利的泰国新世代，尤其是作为“虚拟空间原住民”的新生代，更容易在内部张力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西方的负面影响下，产生极端化的群体性应激反应。

2019 年泰国大选，由于受代际分歧影响，极左翼新生代在政坛强势崛起，其政治代表新未来党首次参选就在新生代“首投族”支持下成为“政坛黑马”，赢得了 81 个众议院议席，跃居国会第三大党，其政党名单制得票率高达 17.34%，远超一众老牌政党。2023 年大选中，作为被强制解散的新未来党政治继承者，远进党更是在极左翼新生代的支持下赢得了 151 个众议院议席，问鼎国会第一大党，其政党名单制得票率也攀升至 37.99%，开始形成对其他政党的压倒性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曾长期对立的保守势力与他信派系“保革和解”，并组建“红蓝联盟”以延续执政地位。

虽然在 2023 年大选后的泰国“橙红蓝鼎立”格局下，“橙色”极左翼新生代受到“红蓝联盟”即“红色”中左翼的他信派系—为泰党以及“蓝色”右翼的新保守阵营的联手抑制，始终未能获得执政地位，但其在美西方势力支持下，通过国会施加政治压力，并在民间引发大规模“反政府”街头运动，却对泰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产生了持续冲击。从美西方外交官 2019 年为受到泰国司法审查的新未来党主席塔纳通站台^③，到 2024 年为受到泰国司法审查的远进党主席皮塔撑腰^④，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势力逐渐成为美西方干涉泰国事务的重要抓手，并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中泰长期以来“守望相助”的地缘安全共识引发泰国极左翼新生代担忧

建交 50 年来，中泰双方共同应对了一系列传统 / 非传统安全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守望相助的地缘安全共识，成为中泰关系持续向好的重要“催化剂”。例如，建交之初，由于受冷战遗留问题影响，中泰关系回暖步伐相对平缓，尤其是泰方在地缘安全问题上依然对华存在战略疑虑。不过，随着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泰双方在共同应对中南半岛地缘安全风险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战略共识，并围绕柬埔寨问题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柬埔寨问题妥善解决，中泰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紧迫性下降，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则持续提升。习近平主席回顾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中泰在应对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疫情、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汶川地震和泰国洪灾等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过程中，始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⑤例如，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仅在国际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6 日。

② 《习近平会见泰国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上将》，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112/t20111224_7999367.shtml，2011 年 12 月 24 日。

③ "Don slams diplomats for accompanying Thanathorn",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659052/don-slams-diplomats-for-accompanying-thanathorn>, 2019 年 4 月 9 日。

④ "Foreign envoys' meeting with Pita criticised as undiplomatic and as pressure on Charter Court", Thai PBS World, <https://world.thaipbs.or.th/detail/Foreign-envoys%E2%80%99-meeting-with-Pita-criticised-as-undiplomatic-and-as-pressure-on-Charter-Court/54194>, 2024 年 8 月 8 日。

⑤ 《习近平会见泰国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上将》，中国外交部网站，2011 年 12 月 24 日。

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通过双边渠道为泰国提供了高达 10 亿美元的贷款，而且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为缓解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泰战略合作稳步推进，双方在安全领域合作更为全面化和机制化。从传统安全领域来看，中泰两国国防部于 2001 年建立了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从而有效促进了军事合作深化发展。以联演联训为例，2005 年中泰海军在泰国湾海域举行了代号为“中泰友谊-2005”的联合搜救演习，成为中国海军首次与东南亚国家海军举行联合演习；而中泰联合训练更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开展最早，且覆盖陆（代号“突击”）、海（代号“蓝色突击”）、空（代号“鹰击”）三军。此外，中泰双方在军方高层交往、军事教育与培训、舰艇访问、军援军售、国防工业合作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效。^① 从非传统安全领域来看，中泰双方在维护金融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领域都开展了广泛合作与机制化建设。^②

随着中泰双方在地缘安全上的合作共识持续加强，曾经“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战略天平开始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对此，有泰国学者形象地指出，“今天暹罗小姐（泰国）已经做好准备，离开‘山姆大叔’（美国）投身北京‘阿哥’（中国）的怀抱”^③。这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加剧的地缘竞争背景下，引起了美西方强烈不满，使得近年来泰国面临“选边站”压力大幅增加，而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极左翼新生代领袖，则成为美西方的重点施压对象，试图以战略威胁瓦解泰国新世代的外交自主意志，并在一定程度上初见成效。例如，面对美西方施压，曾长期高居泰国民意支持率榜首^④的前远进党主席皮塔表示，“泰国坚持友华立场使美国深感担忧”，“如果无视特朗普意愿，继续沿着友华道路前进，将会彻底改变美国的对泰善意，从而引发难以承担的严重后果。”^⑤

（二）泰国政治极化背景下，中泰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政治互信受到极左翼新生代质疑

虽然同为后发国家，但中泰双方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自主选择的道路大相径庭，从而使得双方在国家运作体系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并在冷战前期一度引发误解与摩擦。不过，随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共识，中泰建交以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互信，“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⑥。

这一方面得益于两国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从而有效避免了政治误判风险，切实提升了中泰关系“稳定性”。1978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建交后首位访泰的中国领导人。自此，中泰高层开启了日益密切的交流与沟通。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国领导人都曾先后访泰或赴泰出席会议。与此同时，泰国历任总理、国会主席和军队领导人亦曾访华。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中泰双方都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⑦。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

① 刘琳：《中国对东南亚军事外交：演变、现状及挑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1 期。

② 宋清润、王斌：《全球安全倡议与中泰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南亚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③ สุชาติ บำรุงสุข (素拉差特·邦穆鲁萨克)：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พิเศษ ไทย-จีน ภูมิทัศน์ใหม่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中泰特殊关系：泰国外交新格局)，มติชนสุดสัปดาห์ (民意周刊)，https://www.matichonweekly.com/column/article_43670，2017 年 7 月 6 日。

④ “ผลโพลนิด้า ‘พิธา-ก้าวไกล’ ยังรั้งอันดับ 1 คะแนนนิยมการเมือง” (NIDA 民调结果：“皮塔-远进党”依然高居政治支持率榜首)，Thai PBS，<https://www.thaipbs.or.th/news/content/341540>，2024 年 6 月 30 日。

⑤ พิธา ลิ้มเจริญรัตน์ (皮塔·林贾伦拉特)，หมัดกับไทย：อดีต ปัจจุบัน และอนาคต 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สหรัฐฯ ในยุคทรัมป์และแนวโน้มในอนาคต 2 (特朗普与泰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分析泰美关系特朗普时代及未来前景 2)，มติชนสุดสัปดาห์ (民意周刊)，https://www.matichonweekly.com/column/article_831056，2025 年 3 月 12 日。

⑥ 《习近平会见泰国外长素拉蓬》，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207/t20120704_9303965.shtml，2012 年 7 月 4 日。

⑦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赛塔》，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310/t20231019_11164199.shtml，2023 年 10 月 19 日。

家,泰国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并不认同“现代化=西方化”发展模式。这就为中泰双方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携手同行提供了坚实基础。21世纪以来,泰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遭遇挫折,引发国内社会分裂与政治冲突。为稳定国内局势,泰国保守阵营于2014年以政变方式接管了国家权力,引发美西方强烈不满与政治施压。美国不仅暂停了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T)和外国军事融资(FMF)项目下数百万美元援助,而且大幅减少了双边高层互访。2015年初,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Daniel Russell)访泰期间,甚至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中公开批评巴育政府。^①与此相对,中国则是“重申对泰国政局的理解,支持泰国为实现国家改革、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路线图’所作的努力”^②,并愿意通过交流互鉴,为泰国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此,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泰方正在探索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同中方交流互鉴”^③,并在治国理政方面认真借鉴中国经验,甚至要求内阁成员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④。2023年大选后,泰国开启“保革和解”进程,相继出任“红蓝联盟”民选总理的赛塔与佩通坦更进一步强调,泰方“愿意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⑤,尤其“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成功发展经验”^⑥。

对于中泰双方持续提升的政治互信,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道路吸引力,美西方深感担忧,认为“泰国政策制定者正受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和吸引”,从而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日益远离美国的传统影响。^⑦于是,近年来美西方抓住泰国“橙红蓝鼎立”的政治极化态势,利用极左翼新生代“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冲动,通过宣扬“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等荒谬言论,误导泰国反对派的对华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例如,2020年针对巴育内阁的不信任辩论中,反对派就明确提出巴育政府对华合作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应当暂缓并予以检讨。^⑧

(三) 社交媒体时代,“中泰一家亲”社会文化交流的传统路径,难以克服泰国极左翼新生代的信息茧房

作为国家运作体系下最具惰性的环节,“社会文化结构”为中泰关系提供了“稳定性”的重要保证。^⑨对此,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曾指出,中泰“两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关系,其重要原因是泰中两国人民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同时强调,“双方的接触和交往犹如朋友和亲戚般密切,这为促进两国外交关系和诸领域的合作取得满意结果奠定了稳固坚实的基础”^⑩。

从传统文化渊源来看,泰国长期以来深受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的双重影响,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华人移民,更成为维系中泰友好关系的坚韧纽带。据估算,20世纪中叶的泰国华人移民数量高达300万

① "Remarks of Assistant Secretary Daniel Russel",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https://th.usembassy.gov/remarks-of-assistant-secretary-daniel-russel/>, 2015年1月26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412/t20141224_9303994.shtml, 2014年12月24日。

③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巴育》,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411/t20141109_9303990.shtml, 2014年11月9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在曼谷正式发行》,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08/c_1120773816.htm, 2017年4月8日。

⑤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赛塔》,中国外交部网站, 2023年10月19日。

⑥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412/t20241218_11497824.shtml, 2024年11月16日。

⑦ "The Future of Thai-U.S. Relations: Views of Thai and American Leaders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Ways Forward", White Paper, Project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between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sia Foundation, August 2018, 21.

⑧ Aekarach Sattaburuth, "Govt too submissive to China",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65574/govt-too-submissive-to-china>, 2020年2月26日。

⑨ 庄国土:《文化相似性和中泰关系:历史的视角》。

⑩ 《江泽民主席会见泰国国王 普密蓬国王举行国宴欢迎江主席》,《人民日报》1999年9月3日。

至400万。^①中泰建交后,随着“双重国籍问题”得到妥善解决^②,泰国长期担忧的“华人归化困境”^③不复存在,从而为中泰社会文化交流扫清了障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各类文化艺术代表团互访不断,迄今已有近千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泰,而泰国作家、画家、电影、图书协会等代表团也相继访华,并先后派出六十多个艺术代表团访华演出。^④与此同时,两国传统与当代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并广为流传,而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影视交流更是迅速发展。作为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根基,21世纪以来汉语教学在泰国掀起热潮。从2006年设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泰国已拥有17家孔子学院和11家孔子课堂,成为亚洲设立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最密集的国家之一。目前,泰国已有200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在校学习中文人数超过100万。^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来临,泰国新世代在对华社会文化交流路径方面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尤其是作为“虚拟空间原住民”的新生代,更是主要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了解中国,而不再是传统的广播电视或印刷品。据统计,2024年泰国互联网渗透率为91.2%,16岁以上群体的日均上网时长近8小时,日均收看广播电视时长约3.5小时,日均阅读印刷品时长仅2小时。^⑥这就使得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内容,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的对华认知与观感。^⑦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西方势力开始在中国周边频繁发动“网络舆论战”,试图损害周边国家对华关系,而“中泰一家亲”传统友好关系,则使得泰国成为重灾区。由于在泰国新世代常用的网络社交媒体中,每月活跃用户数量位居前列的LINE(5600万)、Facebook(5100万)、YouTube(4760万)等^⑧,均在美西方势力操控之下,导致泰国互联网不仅充斥着大量美西方炮制的涉华“假新闻”,而且在平台算法加持下肆意编织“信息茧房”,阻碍甚至屏蔽泰国新世代对华形成客观准确全面认知。对此,泰国政府开展了“清网”行动,并成立“反假新闻”中心负责监管,但迄今收效甚微。^⑨这就在中泰社会文化交流上造成了代际断层,并导致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很容易在“网络舆论战”误导下,对华产生负面认知,甚至做出有损于中泰友好关系的错误举措。

(四)“泰式民主”面临争议背景下,泰国王室对极左翼新生代难以发挥传统意义上的积极示范与引领作用

尽管从体制上看,泰国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在“泰式民主”意识形态下,泰国王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拥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⑩中泰建交后,泰国王室始终秉持对华友好立场,成为中泰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支柱。对此,习近平主席曾评价指出:“泰国王室长期关心重视中泰关系发展,为中泰友好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⑪

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十分重视中泰关系发展,不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重要成就,而且积极支持中泰文化交流。作为拉玛九世册封的“女王储”,诗琳通公主更是于2019年成为中国“友

① Skinner, G.W.(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1.

②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2—354页。

③ [泰国]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④ 《泰中文化交流渊源知多少?——专访泰国前国会主席、泰国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颇钦》,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06-03/10228060.shtml>, 2024年6月3日。

⑤ 付志刚:《泰国成立孔子学院(课堂)发展联盟》,《光明日报》2021年10月9日。

⑥ Simon Kemp, "Digital 2025: Thailand", Datareportal,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5-thailand>, 2025年3月3日。

⑦ 单韵鸣、林秘密、蓝梓钰:《泰国曼谷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调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⑧ Simon Kemp, "Digital 2025: Thailand".

⑨ Patpicha Tanakasempipat, "Thailand unveils 'anti-fake news' center to police the internet",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technology/thailand-unveils-anti-fake-news-center-to-police-the-internet-idUSKBN1XB48N/>, 2019年11月1日。

⑩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⑪ 《习近平就哇集拉隆功就任泰国国王致贺电》,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612/t20161202_7999506.shtml, 2016年12月2日。

谊勋章”获得者。她不仅是首位访华的泰国王室成员，而且在诗丽吉王后指引下于1980年开始学习中文，并在此后四十多年里访华多达五十余次，成为在泰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①

不过，泰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泰式民主”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拥护，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前国王拉玛九世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其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访贫问苦过程中树立的道德典范。2016年拉玛九世驾崩后，虽然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顺利继位，但却未能有效承接先王以人格魅力为核心的庞大社会影响力，从而导致“泰式民主”意识形态面临“空心化”问题。近年来，泰国保守阵营一直在努力重塑“泰式民主”意识形态，但却未能完全赢得新世代尤其是新生代的理解与认同，反而引发双方日趋激烈的分歧甚至冲突。2020年泰国极左翼新生代掀起大规模街头运动期间，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公开集会上首次提出“王室改革十大要求”，从而在根本上质疑了“泰式民主”意识形态的正当性。^②

尽管拉玛十世公开呼吁泰国是“和解之地”^③，但泰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代际分歧却始终未能有效弥合。2024年，泰国宪法法院在保守阵营推动下，以危害“君主立宪制”为由判决解散了极左翼的远进党，并禁止包括总理候选人皮塔在内的11名党执委10年内从政。^④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极左翼新生代对“泰式民主”意识形态的不满情绪。目前来看，随着泰国政治极化持续加剧，泰国王室对极左翼新生代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弱化，不仅在包括对华友好等方面难以发挥传统意义上的积极示范与引领作用，而且存在引发极左翼新生代“逆反情绪”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泰国“未富先老”难题困扰中泰关系“确定性”

建交以来，中泰双方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战略共识，积极推动经贸领域合作，从而不仅为彼此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可持续的前进动力，而且为中泰关系持续向好的“确定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主席曾评价指出：“作为本地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加强双边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⑤然而，近年来泰国日趋严重的“未富先老”问题，却造成新世代尤其新生代与旧世代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上“存量博弈”的代际分歧，致使旧世代依托中泰经贸合作推动“增量改革”的政策构想也在美西方误导下，引起了极左翼新生代的质疑与抵制。

（一）经贸合作为中泰关系“确定性”提供支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作为国家运作体系下最具可塑性与成长性的环节，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中泰关系的发展走势（见图1）。建交以来，得益于中泰经贸合作的持续高速增长红利，不仅为泰国“政治结构”的不同阶层提供了丰厚回馈，从而促成各派力量放下成见并达成对华合作共识，并且为“社会文化结构”的中泰人文交流互鉴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这就形成了以中泰经贸合作为驱动力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的螺旋上行态势，并在此基础上锁定了中泰关系持续向好的“确定性”。

中泰建交前，由于受美西方主导的冷战影响，泰国军政府曾禁止进口一切中国大陆商品，从而导致两国正常贸易被迫中断长达15年。然而，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却使得双边贸易在建交后迅速复苏，并成为中泰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据统计，从1974年到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339万美元增至8.84亿美元，年均增幅17.4%；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1977年至1980年，贸

① 《走遍中国大地的泰国公主》，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zggcddwjw100ggs/jszgddzg/202208/t20220824_10750624.shtml，2022年8月24日。

② Hathairat Phaholtap & David Streckfuss, “The Ten Demands that Shook Thailand”, New Mandala, <https://www.newmandala.org/the-ten-demands-that-shook-thailand/>，2020年9月2日。

③ “King declares ‘love’ for all, calls Thailand ‘land of compromise’”,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012131/king-declares-love-for-all-calls-thailand-land-of-compromise>，2020年11月2日。

④ “Court dissolves Move Forward Party”,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843182/court-dissolves-move-forward-party>，2024年8月7日。

⑤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英拉》，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1204/t20120418_7999383.shtml，2012年4月18日。

易总额更是从0.61亿美元猛增到4.51亿美元，近乎每年翻一番。^①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泰双边贸易总额更是从2001年的65.7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639.9亿美元。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并延续至今。2024年，中泰贸易总额已增至1158.5亿美元，占泰国外贸总额比重高达19.6%，相较1998年占比增长近6倍。^②

建交五十年来，中泰经贸合作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互利共赢的高度契合性。从冷战中后期来看，一方面是泰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国家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因此将中国市场视为关键性的新增长点；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于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迫切需要来自国际市场的贸易与投资。这就使得两国在经贸合作上产生了“同频效应”，不仅在贸易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且随着双方1985年成立部长级经贸联委会，并签署《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1985年）、《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1986年）等一系列合作协议，投资领域也开始加快步伐。例如，作为泰国政商财阀的重要代表——谢氏家族的正大集团率先投资中国，并成为了深圳首家外资企业。

冷战结束后，泰国于20世纪90年代转向“全面自由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在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的过程中享受了金融泡沫红利，其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853.4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30亿美元，从而被誉为“亚洲四小虎”。这一时期泰国在烈火烹油的经济繁荣下所拥有的开放包容与积极进取，恰好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再次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遥相呼应，从而不仅有力推动了20世纪末中泰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而且为21世纪初叶中泰经贸合作的“爆发式”增长夯实了基础。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泰国遭受重创，不仅社会经济大幅衰退，而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错失了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历史契机。21世纪以来，泰国开始新一轮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但却引发了“他信经济”^③与“充足经济”^④的道路分歧，以及保革双方长达近二十年的社会分裂与政治冲突。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厚积薄发，尤其是在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拥抱“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迸发出磅礴动力，呈现持续高增长态势，并先后超越法英德日等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使得21世纪以来，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成为泰国保革双方战略共识。任何一方主政都会在对华经贸合作方面保持高度的“确定性”。2012年，泰国革新阵营他信派系——为泰党的英拉总理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2022年，泰国保守阵营的巴育总理则与中国确立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前景目标。

（二）泰国“未富先老”对中泰经贸合作的结构性困扰

得益于21世纪以来中泰经贸合作的全面深化发展，泰国在国内政经乱局与全球经济波动双重压力下，依然保持了年均经济增速接近4%的上行态势，使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841美元，增至新冠肺炎前7628美元的历史新高。^⑤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泰国“保革冲突”，避免了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并为旧世代“保革和解”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近年来“未富先老”困境，却使得泰国新世代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上与旧世代产生代际分歧，并对旧世代保革双方在对华经贸合作上的长期共识产生质疑，甚至在美西方势力误导下引发不满情绪与抵制行动，从而对中泰关系的“确定性”造成了困扰。

从2005年开始，泰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并将于2029年步入“超老龄化社会”^⑥。这就使得曾经支撑传统产业竞争力的“人口红利”，正逐步转变为沉重的社会负担，进而引发国内需求不足、传统

①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第367—368页。

②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https://www.bot.or.th/en/statistics/external-sector.html>，2025年4月13日检索。

③ 李峰：《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④ 周方治：《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

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25年4月8日检索。

⑥ "Thailand's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s towards healthy age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southeastasia/news/feature-stories/detail/thailands-leadership-and-innovation-towards-healthy-ageing>, 2023年2月9日。

产业竞争力下降、新兴产业转型升级乏力等诸多结构性难题，使得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持续上升。面对日趋严峻的“未富先老”困境，泰国旧世代的保革双方开始放下道路分歧，相继达成“国家 20 年发展战略规划”“工业 4.0”“经济走廊建设”以及“生物、循环、绿色（BCG）新经济模式”等发展共识，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前进方向。

但是，由于长期道路分歧，泰国已错失了 21 世纪初的“增量改革”最佳契机，转而面临“存量改革”的现实难题。统计显示，泰国中央政府负债率和家庭负债率分别从 2003 年 27.1% 和 42.1%，猛增到 2021 年的 58.5% 和 89.8%，使其很难再以“加杠杆”方式为“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①与此同时，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尤其是美西方“逆全球化”负面影响，近年来泰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增速也明显放缓，难以进一步提供可持续的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如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改革成本”很可能要新世代尤其是新生代背负。统计显示，泰国 15—24 岁青少年失业率已从 2013 年的 1.3% 猛增到 2024 年的 5.2%，并且远高于同期 1.02% 的全国失业率。^②这使得大量极左翼新生代在被迫选择灵活就业之际，对旧世代主导的“红蓝联盟”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与相对剥夺感。

针对“存量改革”难题，“红蓝联盟”试图进一步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以获得更多外源动力。但问题在于，中泰经贸合作并不完全是“帕累托改进”，而是必然会造成泰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产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难以避免地导致转型升级的“摩擦成本”。由于旧世代的既得利益群体拥有更多的议价权，因此中泰经贸合作的外溢负面影响，将更可能转嫁给新世代尤其新生代。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在美西方势力误导下，很容易产生中泰经贸合作有利于旧世代，但却严重损害新世代的错误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抵制行动，从而为蓬勃发展的中泰合作前景蒙上阴影。

例如，面对当前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行业，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却以中国廉价商品挤压泰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为由，迫使泰国政府于 2024 年 7 月宣布施行《增值税公平法案》，取消了跨境电商低价商品免税待遇，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7% 增值税。^③又如，面对泰国旅游业最大海外客源国，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却以“王星事件”为由，借口打击“非法劳工”与“跨国犯罪”对泰国政府施压，试图限制甚至废止“对华免签”政策。^④再如，面对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占外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比重从 2012 年的 1.45% 稳步增至 2023 年的 5.17% 的良好态势，^⑤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却以美西方炮制的“中资灰产”概念^⑥为由施压，掀起打击“中资灰产”的政治运动，将少数负面现象“泛化”和“扩大化”，借以抹黑中国海外资本，试图从根本上瓦解中泰关系“确定性”。

四、“化危为机”推动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

随着泰国极左翼新生代强势崛起，以及“橙红蓝鼎立”政治极化格局成型，代际分歧开始成为影响中泰关系“稳定性”与“确定性”的现实挑战。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美西方势力介入的外部环境影响，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代际分歧对中泰关系的短期负面冲击。不过，如果从“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长期目标来看，泰国当前愈演愈烈的代际分歧，却也同样蕴含着难得的重要历史契机。

由于 21 世纪以来泰国深陷保革冲突，始终无法有序推动现代化道路“再选择”，导致其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近年来，虽然泰国通过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保持着社会经济增长态势，但其内生动力不足的弊端日益明显，逐渐难以跟上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前

①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25 年 4 月 10 日检索。

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25 年 4 月 10 日检索。

③ 《泰国 7 月 5 日起对进口商品课征 7% 增值税》，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itpp.trb.mofcom.gov.cn/article/zhxx/myhj/202407/21314.html>，2024 年 7 月 10 日。

④ 《泰国拟缩短免签》，《联合早报》网站，<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50328-6087615>，2025 年 3 月 28 日。

⑤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2025 年 4 月 13 日检索。

⑥ Raymond, G.V.(2025). Explaining 'Grey Capital': The Sociology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Companies and Crim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4(152), 1-16.

进步。目前来看，无论是中泰高铁建设进展缓慢的“硬联通”瓶颈，还是中泰合作在合格评定互认、外资准入限制、外国人从业禁止等方面的“软联通”梗阻，都在持续影响中泰合作的契合度与成效比。

泰国当前的代际分歧，根源于新世代尤其是新生代对既有发展模式的质疑与不满，以及对探索更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现代化道路的强烈诉求。尽管在美泰传统盟友关系下，作为泰国新世代的探路者，极左翼新生代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到美西方误导，但对包括泰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西方化”并不具有可行性，而美国当前推动的“逆全球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政策，更会从根本上撕碎泰国新世代对美西方的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迫使其重新选定现代化道路的借鉴对象。于是，作为后发国家成功典范，中国式现代化很可能得到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打通中泰合作的瓶颈与梗阻，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的前进道路。

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立足“中泰友谊金色50年”的历史节点，依托务实合作发挥外部环境的积极引领作用，增进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民心相通”，促成泰国对华战略合作的代际共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随着2025年2月中泰双方发表《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推进代际共识的相关合作正得到有序落实。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立足国际/地区多边合作尤其“全球南方”合作，拓展中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增强泰国新世代底气，对冲美西方“选边站”压力

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中等国家，泰国在中美博弈持续加剧背景下，很难独自承受美西方的“选边站”压力。这也是泰国在二战与冷战期间，基于“风中竹”策略，先后被迫“站队”日本与美国的重要原因。但对冷战后成长起来的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而言，放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屈从于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难以接受的外交选择。于是，加强国际/地区多边合作尤其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泰国新世代在面对美西方施压时的“孤立感”，进而切实增强其“抗压”底气，提升其独立自主选择对华合作的战略定力。

为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国际事务协作，为共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长远发展作出积极努力”^①。2025年的中泰《联合声明》也“重申共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强调两国将“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同时“重申致力于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推进次区域合作”，并“进一步加强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亚洲合作对话等多边平台下的战略沟通”^②。近年来，作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大金砖合作”有效增强了泰国直面地缘政治风险的自信心。2025年1月，泰国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其外长玛里赞誉指出：“加入金砖合作将有效提升泰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使其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③

（二）推动中泰经贸合作的转型升级，依托中国技术、资金、市场等优势为泰国新世代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切实增强对华合作“获得感”

对于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而言，中泰经贸合作能否为其提供“获得感”的正反馈，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其在对华合作的政策选择上能否与旧世代达成代际共识。不过，新世代的“获得感”难以

① 《习近平同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xgxw_676938/202211/t20221119_10978187.shtml，2022年11月19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7_676944/202502/t20250208_11551388.shtml，2025年2月8日。

③ "Thai foreign minister says Brics role is a step forward",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977101/thai-foreign-minister-says-brics-role-is-a-step-forward>，2025年3月11日。

通过“存量改革”方式予以满足,否则就会导致既得利益的旧世代产生“被剥夺感”,从而引发新的代际分歧。这就意味着,中泰经贸合作需要在既有基础上提供大量可持续的超额红利,以促成“增量改革”,一方面保持并增加旧世代的既得红利,另一方面则有效满足新世代的红利共享诉求。

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两方面工作重点。其一是“分享中国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①,为泰国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和特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有利条件,既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加的高品质消费需求,也为泰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例如,在7届进博会中,泰国先后有近400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2.8万平方米。第七届进博会泰国参展企业更是达80家,创下历史新高。^②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坦表示:“进博会为泰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拓展了更多渠道,给泰国企业提供了充分展示潜力和能力的机会。”^③

其二是“深化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④,从而为中泰经贸合作提供“高附加值”创新红利,避免在传统产业领域“内卷”。为了更好地承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2024年泰国佩通坦总理在其施政报告中明确将新能源汽车、光伏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⑤近年来,随着华为、中兴、比亚迪、长城、天合光能、阿里巴巴等在泰投资项目相继落地,中泰双方开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形成更紧密的产融合作,并为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树立了成功样板。^⑥

(三)加强人文交流,拓展文化互鉴,尤其是多渠道提升泰国新世代的对华理解与认同,延续“中泰一家亲”传统友好关系的代际传承

相较于长期深受“泰式民主”意识形态影响的旧世代,泰国新世代尤其是新生代在接纳新思想方面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助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创新与价值再发现,从而为“中泰一家亲”传统友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夯实“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识。

为此,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泰双方“要加强青年交流,使两国人民心更近、情更深,丰富中泰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内涵”^⑦。从交流合作来看,既要充分发挥传统优势,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方式,多渠道深化两国新生代在教育、科技、文旅、生态、环保、卫生、体育、创业等领域的人文交流与文化互鉴,切实提升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的对华理解与认同,也要针对美西方“舆论战”,依托Tiktok等新兴社交媒体,积极挖掘短视频、直播、AI+等传播技术,讲好“中国故事”“鼓励开展两国媒体、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合作,打击假新闻,增进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⑧。

五、结 语

中泰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已稳步形成了安全互助、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态势,并进一步确立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目标。不过,泰国当前正处

①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赛塔》,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10月19日。

② 《第八届进博会推介活动在泰国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网站, <https://www.ciie.org/zbh/bqgffb/20250228/48468.html>, 2025年2月28日。

③ 《泰国副总理:进博会正为全球企业带来新机遇》,央广网, 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31104/t20231104_526474656.shtml, 2023年11月4日。

④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2月6日。

⑤ คำแถ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施政报告)นางสาวแพทองธาร ชินวัตร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แถลงต่อรัฐสภา(泰国总理佩通坦·钦那瓦女士向议会发表声明)๑๒ ก.ย. ๒๕๖๗(2024年9月12日) เล่ม ๑๔๑ ตอนพิเศษ ๒๕๑ ง หน้า ๗(第141卷,第251期特刊,第7页)。

⑥ 王思成:《在泰中企:推动“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日。

⑦ 《习近平同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11月19日。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2月8日。

于代际更迭的过渡期，经历过冷战苦难的旧世代与冷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尤其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中美战略博弈等外部环境影响，如何选择更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促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调适转型，并为良好的“安全结构”提供有力支撑，存在代际分歧，从而影响到泰国内政外交，并对中泰关系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产生了不确定性冲击。这对中泰关系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相较于旧世代，泰国新世代尤其新生代更为开放与包容，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作用下，有效化解 21 世纪以来泰国现代化道路“再选择”改革困局，进而打通中泰合作的发展瓶颈。为了在新时期“化危为机”，有必要立足国际/地区多边合作尤其“全球南方”合作以化解美西方对泰“选边站”施压，推动中泰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以增强泰国新世代“获得感”，拓展两国新生代人文交流以延续“中泰一家亲”传统友谊，从而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更宽广的前进道路！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China-Thail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al Changes

ZHOU Fang-ye^{1, 2}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2. Institute of Thai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unming, 650034)

Abstrac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bilateral ties have steadily developed into a positive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security assistance,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reciproc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 A new development goal has also been established to jointly build a “China-Thail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owever, Thailand is undergoing a cr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generational changes. Influenc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re-selection” of domestic modernization path,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and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ailand is facing a pronounced generational divid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generations, which caused uncertainties in the previously stable and predictable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To turn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in and to further deepen strategic China-Thailand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leverage the demonstrative rol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include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Global South, to counter Western (particularly U.S.) pressure on Thailand to “take sides”. Additionally, upgrading China-Thail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among Thai younger generation. Expanding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new generations of both countries will also help sustain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of “China and Thailand are one family”, thereby paving a broader path for constructing a “China-Thail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Generational Change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a-Thail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责任编辑：陈慧妮、赵蔚平]